

中国先秦经典死亡伦理思想及其当代启发

姚站军

(江苏师范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中国先秦传统经典死亡伦理文化主要包含儒、道、兵、墨等的死亡伦理思想。它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蕴含着丰富的死亡伦理思想智慧。儒家强调死亡的社会属性，提倡“杀身成仁”“舍身取义”。道家则注重人自身的存在价值，反对追名逐利，主张通过养生以“尽年”，“守道”以“久生”，“合道”以“永生”。兵家认为“道”可以使“上下同欲”，生死与共。墨家以“兼爱”众生为基本出发点，提倡“节葬”“非攻”。他们虽各有主张，但也有共识，比如尊“道”、爱民等。这些死亡伦理思想智慧对于当代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都有重要启发。

关键词:先秦诸家；死亡伦理思想智慧；尊道爱民；当代启发

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6)06-0076-06

一、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死亡伦理智慧及其当代启发

孔子的死亡伦理思想包含两种倾向，一方面他从积极方面建构了死亡伦理精神，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朝闻道，夕可死”（《论语·里仁》）。孔子还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孔子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坚定不移地追求仁道，当身处保存生命与捍卫仁道的两难境地时，应果断放弃生命以成就仁德。可见，孔子的死亡伦理思想要求生时为道义而努力奋斗，死时为道义而英勇献身。由此，生命的价值通过死亡的价值得到升华与延伸，生命的担当通过死亡的意义得以彰显，生命通过死亡获得新生，人生因此由有限转化为无限。而孔子的死亡伦理智慧就在于不仅能激发活着的人通过践行仁道来实现人生价值，而且通过对捍卫仁道而献身的志士仁人的死亡伦理精神价值的挖掘、赞扬和倡导，既安抚了亡故的英灵，又激励着更多活着的人们珍惜当下继续前行。

另一方面，孔子的死亡伦理思想中也有看似消极的成分，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他认为死生祸福由命决定，这被许多当代人认为是消极的生死伦理观，可能会误导人们放弃人生努力，消极无为。其实，孔子的“死生有命”的死亡伦理思想也警示了人们：“生之有死”此乃自然之道、必然之理，世间万物皆如是，与其贪生恶死白折腾，不如关注生存质量，从而活得更清醒和安顿，坦然走进死亡。孔子在死亡伦理观上虽然宣扬天命论，但并非完全不要人命的主观努力，而是认为主观努力正是天赋予的使命。这种思想与西方新教伦理精神中的“天职观”（为上帝的使命而在人事中主观努力奋斗）颇为相似。对于人死之后的鬼神说法，孔子认为：“事鬼神而远之，可谓智矣”（《论语·雍也》），也就是主张不要停留

收稿日期:2016-07-27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当代中国死亡伦理研究”(2014SJB37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个体到民族、从产业到社会的当代中国死亡伦理研究”(14BZX085)；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境外研修项目(2015-2016)；江苏师范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项目(14XWR012)

作者简介:姚站军(1978—)，男，湖南新邵人，江苏师范大学校聘副教授，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研究员。

在形式上的敬神事鬼，而应该多下功夫在实际行动上对先祖尽忠尽孝。这一主张，对当代中国死亡伦理建构具有一定借鉴价值。从孔子的“生死有命”所内涵的死亡与“命”的联系中，可以看出他将人的最终死亡归因于人类所不能掌控的“命”的力量。他进而思考了命运与伦理的关系，提出：“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这样“道”“天”与“命”息息相关，即命运的生死伦理思考在人的生命历程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人的生命来说，“生与死”及其基础上的“富与贵”“荣与辱”等都是命运的不同方面表现。一个人的生命源自偶然，而死之于人却是必然的，谁也没法违背这一亘古不变的命运法则。正确对待死的关键，在于对死亡的伦理价值追问超越这不变的命运法则，这对于当代人过上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生活具有重要启迪。孔子对命运的生死伦理也进行了思考，并告诫自己面对生死命运应有“不怨天，不尤人”的道德修为。

与此同时，孔子也明确地表达了“守死善道”以追求道德人生的理想。他还进一步提出“人能弘道”，即人应该积极热情地完成自身的人生使命以实现人生价值。“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孔子对生命的无限热爱以及对生命价值的不懈追求，消解了其对死亡的焦虑，其死亡伦理智慧将对死亡的焦虑转化为对生命价值的自觉追求。孔子反对无谓的死法，他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论语·述而》）对于那种空手搏虎，赤足过河，即使死了都不会悔悟的人，孔子态度明确不与之共事。因为，从道义上来讲这种“死”毫无价值意义可言。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大夫叔孙豹提出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作为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题，深得孔子赞许。孔子的一生便是典范，他自觉地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人生进取和道德修炼中，在实现人生价值的同时实现了对死亡的超越，被世人尊为“孔圣人”，流芳百世。

与孔子注重伦理道德的“仁”相比，孟子侧重于伦理道德的“义”。当生的机会与社会伦理发生矛盾时，孟子死亡伦理主张选择伦理道德。“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虽主张“舍生取义”的死亡伦理思想，但并不提倡无谓牺牲，对于一些没有社会价值的“义”而献身，他是不认可的。在这一点上与孔子是一致的。他所倡导的死，是“尽道而死”，是要死得其所。因此，他说：“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这种死得其所的“道”才是真“义”。至此，孟子不仅将孔子之“道”“仁”延伸至“义”，也进一步把孔子的“天命”具体到“正命”与“非命”。不仅如此，在《孟子·告天下》中孟子还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可见，孟子深刻地认识到追求正义、实现人生价值绝非坦途，成大事者必然是百炼成钢的。面对各种挑战，我们要勇于迎难而上，“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孟子还进一步指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其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死亡伦理智慧，对于当代中国人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民族取得长足发展都有启迪，对于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更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孔孟儒家死亡伦理从现实的入世主义出发，主张通过生前努力来超越死亡，达到生命的不朽，这为当代中国人克服死亡焦虑提供了力量源泉，并将人们引向人间正道，努力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进德修业之中。此外，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死亡伦理观，为我们提供了有现实价值的道德理念及选择路径。这对后世许多仁人志士影响颇深，形成了“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一系列死亡伦理观。即便在当代中国和平环境中，这种“舍生取义”的死亡伦理精神仍然像一道神圣的光，在一方危难的时刻，指引人们特别是武警官兵、消防队员、人民军队、志愿者等“舍生”相救。在抗洪抢险现场、在抗震救灾区……那些为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壮烈牺牲的英雄们，不正是在用自己宝贵的生命谱写当代死亡伦理的赞歌？当然，在以发展、共享为主旋律的当代中国，“舍生”已不再局限于舍弃性命，它包括舍弃性命在内的牺牲个人利益的一切行为；“取义”也已不再局限于践行

道义,而是包括道义在内的一切公益活动。由此,舍生取义从原先激荡人心的壮烈转化为温暖人心的切实举动,而往往是那些平日里肯为公众利益割舍个人利益的人们,在关键时刻愿意挺身而出,于危难之际献出宝贵的生命,绽放人性的光辉。时代呼唤这种死亡伦理精神,“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只要这种精神深植人心,我们的国家将变得更加和谐稳定,我们的民族将会崛起,我们的中国梦将变成现实。

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先秦道家死亡伦理思想智慧及其当代启发

老子对死亡进行伦理思考时指出:“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亡者寿也。”(《老子·三十三章》)这里的“‘不失其所’就是不要失去所据以存在的‘道’”^[1]。在老子看来,“尊道”“守道”可以“久生”,肉体虽死但价值精神不亡可谓不朽,至于生死又有何患?“吾之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十三章》)我们之所以会有大忧患、会患得患失,是因为我们太在意自身的肉体存在以及世俗的功利宠辱,若将这些统统放下了,又有什么能够困扰我们的呢?与孔孟具有强烈功利色彩的“成仁”“取义”道德教化不同,老子主张“绝仁弃义”“见素抱朴”“复归于朴”“唯道是从”,认为人们不应被形形色色的道德戒律所束缚,在一心外求中扭曲心性,而应回归生命的本真,将道德内化,遵循自然规律。然而,老子并不是否定人生道德价值本身,而是反对流于形式、僵化了的、甚至被工具化了的“道德”。对于个体生命如何做到“与道合一”,从而实现“死而不亡”,老子也进行了路径思考:“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显然“德”是通过“修”“道”得来的,生命个体需心怀不朽的价值坚持方可实现从个体生命到社会生命的转化,进而在个体命运与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融合中,将个体生命价值汇入社会生命价值,从而实现“合道永生”。

老子死亡伦理思想中,还饱含着对百姓大众生死存亡基础的深情关怀。在其著作《道德经》中死亡伦理关怀溢于言表:“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七十五章》)老子死亡伦理思想对新中国伟人毛泽东的影响颇大,尤其是“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七十四章》)这一观点在毛泽东思想中常有体现,甚至被毛泽东的文章直接引用。比如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毛泽东写道:“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的生命个体死亡伦理智慧,主要体现在其养生之道上。柔弱胜刚强的弱式生存中心论的死亡伦理观,在老子死亡伦理思想中可以找到源泉因子:“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老子这句话的深意在于劝诫人们在看待生死问题抑或处理世俗杂事时,“趋生避死”“趋利避害”之心不要太重,过于强调生会加速死亡,过于贪图名利人就会变得腐败;应该把死亡意识、危机意识常存心中,时时警醒,防微杜渐;而当死亡威胁、各种困难挑战降临时,不要一味地顽固抗拒,而要接受现实,顺其自然、顺势而为、灵活变通,从而获得新的契机。

庄子认为生与死乃物之常情,好比气之聚散,万事万物都一样。“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通过大鹏的形象,庄子描绘了自己追求的理想道德人格:“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其死亡伦理智慧在于指引人们从恐惧死亡和追逐名利的双重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从而进入“齐生死”“忘物我”的精神境界。庄子还说:“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庄子·天地》“入于天”就是融迹于自然,就是对生死两分的空间跨越。不仅如此,庄子还进一步说“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庄子·大宗师》“无古今”所以能超越时间达到永恒。而“已外生”类似于老子的“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也就是说,人一旦忘掉肉体生命的存在,便能大彻大悟,心情就会像朝阳一样清新明澈,

就可以见到绝对的道,这种道体现了伦理本体,可以超越时间,超越肉体的生命,获得永恒的生命。庄子死亡伦理的精神境界对当代中国人看待死亡的伦理道德境界修炼,对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以及产业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巨大启迪意义。从当代个体层面来说,庄子的死亡伦理智慧教导人们:“面对死亡不必恐惧和害怕”,自然与你同在。从当代国家层面来说,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必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顺民意,要安顿好百姓的生活,善待人民的生命,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幸福快乐。回望中国历史朝代的灭亡与更替,大多数是由于统治者的暴虐,从而引起百姓反抗最终惨遭灭顶之灾。从当代产业社会的层面来说,资金链是产业界的“生命线”,也是产业界的“高压线”,产业社会中的企业如果只追求金钱利益,缺失产业伦理导致缺乏长期的质量保证,甚至无视消费者的生命安全,以伤害他人的生命作为自己获利的前提和基础,则可能导致企业存亡风险甚至整个产业风险。

庄子在养生方面的死亡伦理思想,与老子一脉相承。庄子认为:“养生之道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已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意思是说,养生的要领在于淡泊名利、随心随性、顺应自然发展规律,做到这些就可以保持身心健康,享有自然寿命而不过早丢掉性命。在物质欲望极度膨胀的当代社会,多少人因深陷追名逐利的漩涡,忽视了精神、灵魂方面的追求,从而导致心态失衡,引发心理疾病、身体疾病,乃至英年早逝。倘若人们能借鉴老子庄子养生方面的死亡伦理智慧,少点追名逐利,多点精神追求,便不再为物欲所累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不再甘于消极被动地害怕死亡、等待死亡,而是积极主动地与之抗争。“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人不能安详地离去,反而要随时忍受心脏按摩、气管插管……急救措施。即使挽回生命,也可能只是依赖生命支持系统维持的毫无生存质量的植物人状态……”^[2]可见,“过度治疗”也可能会给患者及其家人带来不堪忍受的痛苦。基于这点,当确认没有任何复元可能,走在生命末端时选择安乐死,于人于己本是最好的结局,可在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仍鲜有人能如愿。这主要是由于大多数人仍坚持儒家好生恶死的死亡观。孔子有言:“未知生,焉之死?”(《论语·先进》),孟子也直言不讳:“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恶”(《孟子·告子上》)。然而庄子提倡的自由出世的死亡伦理思想却可以支撑当代安乐死的选择。庄子说“夫大块载我以形,老我以生,失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讲的是天地给了我们生命,就是要我们忙忙碌碌,人总要老去的,老了就可以休息了。生命是短促的,不应拘泥于有限的肉体生命形式,而要善待生命,提高生命质量。庄子认为人应该活得自由,得到精神上的超脱,而不是为肉体所束缚。在庄子看来,生命并不是最重要的,与之相比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精神。只有思想的超脱和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肉体只是一个容器,精神的自由才是真正自由。因此,我们要看淡生死,把握现今的人生,努力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庄子这种超然的生存智慧能让人们在任何环境中,哪怕是在面对死亡的境遇中,也能保持心灵自由。在这种意义上提倡尊严死、安乐死,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随着时代的发展,庄子的这种死亡伦理思想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三、以孙子为代表的先秦兵家死亡伦理智慧及其当代启发

在先秦战略家孙子提出的全胜系统战略观中,也蕴含着宝贵的死亡伦理战略智慧。在《孙子兵法》最有战略思维色彩的《计篇》中有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从生死伦理道义的基点出发,反对轻率的用兵战略。孙子在《孙子兵法》中还“阐述了‘以正守国,以奇用兵’(《汉书艺文志》)战略战术”^[3],认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最后伐城”,“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孙子站在战争大战略的高度,提出“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五事”,即五个战略要素的系统观。而且认为五个战略要素中,伦理道义的“道”是首要的。“道者,令民与上同一(意)也,固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孙子兵法·计篇》)也就是说,孙子认为决定生死存亡、胜负成

败的首要战略要素在于道，只有合乎伦理道义的战争战略决策，才能赢得民心。

孙子不仅从伦理道义制高点出发，反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而且从国家存亡和人民生死的大事出发思考战争战略。当代中国死亡伦理对个体生死命运和民族国家存亡命运的关怀所彰显的置之死地而后的战略智慧，与孙子兵法的死亡伦理大战略不谋而合。先秦兵家的吴起后来在实践中，发展了孙武的死亡伦理思想，进而形成了“上下同欲”，即官兵生死与共、上下一心的死亡伦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孙子对于国家存亡的伦理思考，对当代中国死亡伦理建设具有独特价值。就国家存亡问题的思考，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和黄炎培的对话也有所展示。当时黄炎培说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4]从这段对话，我们也可以看出当代中国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居安思危，吸取历史的教训，始终把人民当作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维护人民的利益。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善待人民的生命，让人民的生活有保障，这样中国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四、以墨子为代表的先秦墨家死亡伦理智慧及其当代启发

就死亡伦理思想而言，可以说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是从儒家分化出来的。虽然墨儒两家的死亡伦理思想都强调社会治理，但各有侧重。墨家首先关注的是经济伦理问题。墨子死亡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对民间不良丧礼习俗的评判和纠正上，他反对儒家的“三年之丧”和“繁礼淫乐”，认为这是对社会财富的铺张浪费，会影响社会生产和百姓长期生活的改善。墨子提倡节约葬礼，倡导“节葬非乐”的死亡伦理观，这种简朴、反对浪费的死亡伦理思想也反应了中华民族广大劳动人民的美德诉求。“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处丧之法，将奈何哉！”（《墨子·节葬下》）墨子反对并批判奴隶主的奢侈和各类活人陪葬的暴行，表达了对奴隶的深切同情及伦理关怀。在当代中国，白色面子旧习还在，在某些中国人中根深蒂固，究其缘由主要是现实乡土文化人情面子观中的虚荣心在作怪，再者在父辈暗示中人们也难以做到破旧。

此外，墨子指出：“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墨子·兼爱》）是导致人民死亡等灾难的社会根源。这对当代社会减少甚至避免死亡祸害有重要指导价值。不仅如此，墨子死亡伦理思想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提出的“非攻”思想，因为它一旦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就可让民众免于战患、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不必要的死亡。墨子为代表的先秦墨家所提出的不管是“节葬”还是“非攻”的死亡伦理主张，其基本出发点都是“兼爱”众生，其哲学基础是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学说。这些与墨家死亡伦理思想紧密相关的学说，与当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追求平等互利共赢、和平发展、和谐崛起，但不忘积极防御的战略智慧是相通相融的。当然，为了贯彻“节葬”“非攻”等思想，墨子还提出“天志”“明鬼”说，其中具有宗教色彩的死亡伦理思想，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即吸其精华、去其糟粕。

参考文献：

- [1]王中江.出土文献与先秦自然宇宙观重审[J].中国社会科学,2013(5):83.
- [2]罗点点.我的死亡谁做主[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
- [3]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中国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1.
- [4]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149.

Chinese Pre-Qin's Classical Death Ethics and Its Contemporary Inspiration

YAO Zhanju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Chinese pre-Qin's traditional classical death ethics culture mainly consists of death ethics of Confucianism, Taoism, Military Arts and Mohism. Those important thoughts are enriched with diverse wisdoms of death ethics, and show differences though in similarity. Confucians emphasizes the social attribute of death and advocate self-sacrifice for humane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Taoists focus on one's own existence value and opposes seeking fame and money. Taoists advocate having a maximum natural life seeking by keeping in good health, having "a long life" by "keeping Tao" and consider that "to be in unity with Dao" is the only means of having an "eternal life". Military Arts consider that "Tao" can pull people together with one heart and soul to share life and death. Mohists base on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love" to advocate funeral-controlling and no attacking. They have different views, but there also share some agreements, such as respect and comply with "Tao" and love people.

Key words: Pre-Qin Scholars; death ethical wisdom; respect and comply with "Tao" and love people; inspiration in contemporary Times

(责任编辑:黄仕军)

(上接第 61 页)

- [10] 张园园. 企业财务预警模型的比较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J]. 现代商贸工业, 2007(9): 163-164.
- [11] 徐光华, 沈戈. 企业内部控制与财务危机预警耦合研究[J]. 会计研究, 2012(5): 72-76.
- [12] 杨华.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财务危机预警体系构建——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J]. 财会通讯, 2015(1): 49-51.
- [13] 朱洪婷. 基于 Logistic 模型的机械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预警应用与分析[J]. 时代金融, 2015(2): 228-229.
- [14] 高晓辉. 上市公司财务预警模型比较研究[J]. 中国总会计师, 2015(1): 71-72.

Empirical Study on the Financial Early-Warning Model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

—Based on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ZHANG Yuanyuan¹, MA Ming²

(1. College of Busines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2. Chengyang Vocational Education Center, Qingdao 266109, China)

Abstract: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 27 companies of the first ST with financial crisis from 2011 to 2013 were selected as the sample group, each paired year by year. Through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test (K-S inspec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test (T test and MWU test), significant variable indicator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62 variable indicators that reflected enterprise debt-paying ability, profitability ability, shareholder profitability ability, development ability, operation ability and the cash flow ability. Then, the principal components were extracted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variables and eliminate multicollinearity. Finall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before 1-5 years of ST, and predictive abilities were tested as 80%, 94.4%, 75.0%, 59.1%, 63.6%.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model of financial early warning has good prediction ability.

Key words: financial warning; logistic regress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责任编辑:魏 霄)